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牛津通识读本

法国大革命 The French Revolution

[英国] 威廉·多伊尔 / 著

黄艳红 / 译

[英国] 威廉·多伊尔 著 黄艳红 译

牛津通识读本 · **法国大革命**
The French Revolution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法国大革命 / (英) 威廉·多伊尔 (William Doyle) 著, 黄艳红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7.3
(牛津通识读本)
书名原文: The French Revolution: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ISBN 978-7-5447-6496-4

I. ①法… II. ①威… ②黄… III. ①法国大革命
IV. ①K565.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57884 号

Copyright © William Doyle, 2001

The French Revolution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2001.

This Bilingual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nd is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ly, excluding Hong Kong SAR, Macau SAR and Taiwan, and may not be bought for export therefrom. Chinese and English edition copyright © 2017 by Yilin Press, Lt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0-2011-716 号

书 名	法国大革命
作 者	[英国] 威廉·多伊尔
译 者	黄艳红
责任编辑	何本国
原文出版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排 版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毫米×889毫米 1/32
印 张	17.25
插 页	4
版 次	2017年3月第1版 2017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6496-4
定 价	32.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电话: 025-83658316)

序言

沈 坚

1989年，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纪念之时，一种对法国大革命新的历史解释在西方取得了主导地位，这一新的解释被称为法国大革命的“修正主义”。与传统的法国大革命解释不同，这一“修正主义”的观点是，法国大革命的最初动力主要来自思想方面，而不在于社会经济方面；它也不是由资产阶级发动的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而是各种复杂社会矛盾汇合的总爆发，由财政危机触发，后来走向无序；它的影响也主要在思想观念和政治行为方面，对法国社会的改造并不大。

本书的作者威廉·多伊尔就是法国大革命“修正”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早在1980年，作者发表了《法国大革命的起源》一书，迅速扬名，此书也一版再版。1989年，他应牛津大学出版社之邀出版了关于法国大革命的专著《牛津法国大革命史》，此书2002年再版。因此，在这样的基础上写一本导读性的短篇法国大革命史，虽然可以驾轻就熟，但也容易落入俗套，陷入雷同的泥淖。作者说“其挑战性要比乍看起来的大”，不是没有道理的。

但此书依然写出了新意。作者将法国大革命的大众影响以“回响”的方式放在卷首,宛如小说作品的倒叙,让人急于想了解究竟。为了引人入胜,“回响”一章还引用大量为人熟知的作家和历史学家的作品,如奥斯卡·王尔德、柏克、卡莱尔、艾玛·奥希兹、狄更斯、托尔斯泰等,甚至提到在欧美国家家喻户晓的“让他们吃蛋糕吧”的传说,生动展示法国大革命在民众中的影响,并以广阔的视野提到了它的世界影响。

在叙事方式上,威廉·多伊尔一如既往,将自己的观点掩盖在对事件发生发展的娓娓道来之中。该书篇幅虽短,信息量却很大。英语原著在“回响”以后各章都以疑问词开头,如“为何发生”(Why)、“如何发生”(How)、“终结了什么”(What)、“开始了什么”(What)、“历史地位在何处”(Where)。本书分析了革命的起因、过程、结果和过往历史学家们对这一事件的研究和评价。一书在手,可以对法国大革命了然于胸了。

本书译者是我多年相识的学生和同行,也是法国旧制度和法国大革命史的专家,这几年来著述和译著颇丰,勤勉耕耘,必有所得。由专家来翻译专业著作可以避免一些低级错误,读了译著后,还意外发现,译者的中文表达也非常好,译文流畅,用词精到。此书出版可喜可贺,同时向译者表达我的敬意。

该书篇幅不大,序言更该简短,就此打住了。

2016年12月

前言

就一个此前已有各种篇幅的著述的课题写一本小书，其挑战性要比乍看起来更大。我们会想起一些以不同的形式数次“撰写雷同作品”的人士，但我们都不想成为这样的人。所以我的出发点不是复述一个为人熟知的故事，尽管任何自称导论^①的文字某种程度上都免不了这样做。我想讨论的主要是法国大革命意义何在，为何其影响力在发生后的两个世纪中以多种方式持续存在。法国大革命的整个故事，无论是作为18世纪末的一系列事件，还是作为后世脑海中的一整套观念、形象和记忆，都在强有力地证明历史的重要性，并且堪称历史复杂性的显著范例。对于理解19世纪和20世纪，它是个重要参照，对于21世纪是否仍然如此，也许正如一位中国智者所言，言之尚早。

我最初认真地研习法国大革命，是在本科高年级的时候。这得益于诺曼·汉普森的神来之作《法国大革命社会史》的启

① 指原书名中的Introduction。——编注

发。该书的作者如今已年逾八旬，但它仍在重印，这一点我并不意外。后来，我有幸在约克大学成为诺曼的同事。谨以此书纪念我们多年的友谊，并致谢忱。尽管它比诺曼的任何一部作品都更纤薄，但愿他不致认为个中情谊与丰厚的生日礼物相比有丝毫之折扣。^①

威廉·多伊尔于巴斯

2001年4月8日

^① 诺曼·汉普森生于4月8日，与“前言”撰写同日。汉普森已于2011年去世。——
编注



图1 路易十六：踌躇满志的绝对君主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回响	1
第二章 缘起	19
第三章 历程	38
第四章 终点	66
第五章 起点	82
第六章 位置	99
法国大革命大事年表	111
革命历法	119
索引	122
英文原文	135

回 响

“沃辛先生，”《不可儿戏》中的布莱克奈尔夫人说，“你刚才跟我说的话让我觉得有点困惑。在我看来，在手提包里出生，或至少在那里面被哺育——不管提包有没有把手——是对人生基本尊严的一种蔑视，这让人想起法国大革命中一个最恶劣的极端行为。我想，你知道那场不幸的运动导致了什么后果吧？”

沃辛先生想必是知道的。在19世纪，每个有着不错的基本知识的人，都对18世纪末年那场标志性的大动荡有所了解。维多利亚时代的体面人士可能觉得，自己有义务了解1789年及随后法国所发生的事情及其原因，了解随之而来的混乱是如何以一场延续一代人之久的“大战”才告终结的——这场反拿破仑的战争给其父辈或祖辈的生活打上了烙印。沃辛先生一边啃着黄瓜三明治，一边梦想着迎娶布莱克奈尔夫人的女儿，也许他并没有多大的求知欲。不过，即便是他，也很可能了解法国大革命中最糟糕的极端行为，了解它们如何冒犯了生活的基本尊严。他也可能知道，一场群众起义走向了暴民统治，导致君主制被推

翻、贵族受到迫害。他也可能知道，大革命选择的复仇工具是断头台，这种无情的砍头装置致使巴黎的街道上流淌着王党和贵族的鲜血。创造欧内斯特·沃辛先生和布莱克奈尔夫人（她的祖先若是法国人，恐怕也难逃断头台的噩运……）的作者在巴黎的阴暗流亡生活中结束了自己的一生。在巴黎，奥斯卡·王尔德周围布满了第三共和国领导人精心设置的象征物和影像，它们唤起的是对大革命所缔造的第一共和国的记忆。铸币和公共建筑上装饰着“自由、平等、博爱”的标语。每逢庆典，街道上飘扬着红、白、蓝三色的旗帜，这是法兰西民族在1789年采用的三色旗的颜色。每年7月14日的国庆节纪念的是1789年攻占巴士底狱的日子，人民在那一天进攻那座险峻的国家监狱，然后以自由的名义夷平了它。在这公众庆典的时刻，法国的爱国者们高唱《马赛曲》，这是1792年发起反对暴政的战争时出现的颂歌。王尔德在巴黎时，巴黎最壮丽的景观无疑是当时世界上最高的建筑——埃菲尔铁塔，它是1889年大革命一百周年之际一次大型博览会的核心展品。

在法国生活或到访法国的人，不可能不注意到这些回响；或说是拿破仑的回响，他曾在三色旗下踏上征途，曾经驯服并利用了大革命释放的能量，而他的侄子拿破仑三世曾在第三共和国建立之前统治了法国22年。任何人，只要他对法国稍有了解，哪怕只是通过间接渠道了解（要是通过学习法语来了解就更好了，法语当时仍然是大多数人外语学习中的首选），都不能不意识到，那场刚刚走出亲历者记忆的创痛和动荡给这个国家留下的深刻印记。很多人相信，或感觉到，这种印记应该是有益的，某种意义上也是必要的。每个人都知道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

的故事、都为之深感震撼：1793年，王后在群众的欢呼声中走向断头台，而当初她得知人民没有面包时，曾说“那就让他们吃蛋糕吧”。（这个故事仍是家喻户晓，但没人在意，这是个老故事，安托瓦内特出生之前就有了，让-雅克·卢梭早在1740年就听说过。）各个新民族曾以宣告自己的解放为骄傲，或采用三色旗以展望其解放，如1789年布鲁塞尔的爱国者、1796年米兰的爱国者。这一自由的旗帜仍在到处飘扬，从罗马到墨西哥城，从布加勒斯特到都柏林。波兰人先是于1794年高唱《马赛曲》以抵抗对其祖国的瓜分，后来又于1956年唱着《马赛曲》反对苏联的暴政。1789年革命之后，没有几个国家不曾经历过类似的场景，在所有国家，都有人回望那时在法国发生的事件，从中寻求启示、榜样、典范以及警示。

海峡对岸的视角

最超脱于这些做法的，是世界各地的英语国家。它们最近的革命发生在1789年之前，只有爱尔兰除外。即便是当时同情法国人的英语国家人士，也认为法国人给1688年在英国、1776年在美国宣告的自由带来了麻烦。不管怎样，这样的同情者终归是少数。对大多数说英语的人来说，其思想态度的模型早在1790年就由埃德蒙·柏克的《法国革命论》铸成了，它的问世比大革命“最糟糕的极端行为”要早好几年。当时有改革派称，法国人进行的只是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美国人1770年代的反叛（柏克曾是这一事业的支持者）所完成的工作；柏克对这一见解义愤填膺，他坚称法国大革命是某种全新的事物。此前英语世界的历次革命，目的在于保卫自由的遗产免受攻击。而根据

这一新的法国标准，这些革命实际上根本不成其为革命，因为法国人要以全面摧毁的方式来建立他们所谓的自由。如果谨慎一点，如果对祖先的智慧怀有一点敬畏，他们本来能够纠正原有制度中少量而轻微的缺陷，并像英国人那样自由而平和地处置问题。但是他们宁愿追随那种未经尝试的理性梦幻、那些自封的

3 “哲人”，这种人掏空了对君主制、对社会秩序和对上帝的信念。结果就是无政府状态和“猪猡大众”充满嫉妒的统治。柏克预言说，随后将出现更糟的局面，需要建立军事独裁才能结束这一切。尽管没有预见到事态发展会如何血腥，他还是正确地估计到最后会是一位将军获胜。因此，柏克既是批评者，又被尊为先知；但是，英国人在处理事务方面对于法国人的优越之处，看来要在他死去18年之后、在滑铁卢的战场上才能得到完全的证实。

但法国人积习难改，1830年，巴黎发生新的革命（尽管为时更短），三色旗再次飘扬。过去的阴影为何萦绕着未来？随着亲自缔造或亲身经历最初的那场灾变的一代人逐渐离世，历史学家开始把它当作分析对象。今天，这些学者大多已经被遗忘，没有被遗忘的那位，在后世的历史学家们那里也没有得到多少敬意。此人就是托马斯·卡莱尔，但在塑造民众关于法国大革命的观念方面，他的影响比任何人都要大。他的《法国大革命史》（1837年）以不可复制的粗犷笔调，描绘了一幅满是愚蠢和报复的混乱画卷。与柏克不同，他没有为革命者所摧毁的旧制度辩护。他认为旧制度是腐败的，其命运乃咎由自取。当廷臣们在装腔作势、饶舌之人在夸夸其谈时，饥肠辘辘的大众已开始思索他们所受的压迫：“难以言表的混乱无处不在，它在内部翻腾，硫黄味从众多的表面裂隙中溢出。”大革命是群众暴力的



图2 1790年代,漫画家詹姆斯·吉尔雷从伦敦看到的海峡两边的对比

一场大爆发，人们的怨愤之情可以理解，尽管很难为之辩护。试图指挥或引领这场暴动的人，大部分都是蠢货或恶棍，所有这些人自以为是的做法让人心生怜悯。其中最可怕的人物是罗伯斯庇尔，他试图靠恐怖来统治，此后，在非法国人的脑海中，他被永远定格为“海绿色的不可腐蚀者”（既指他的气色，也指他的权威）。他将受害者一个个送上不归路，最后自己也坐着囚车（tumbriel，这个指翻斗小推车的词快要被人忘记了，此后只在这一特殊语境中使用）步他们的后尘。当囚车经过时，“小红帽们发出瘆人的欢呼声”：这里指的是无套裤汉，这些人不穿贵族的齐膝短裤，且以红色的自由帽来张扬其爱国主义。他们，还有他们吵嚷尖叫的女眷，都被发自肺腑的社会复仇欲望驱使着。卡莱尔认为，只有三个人能够疏导这种本能的力量。一个是米拉波，但他于1791年死去，其志未酬。另一个是丹东，1792年他曾凭自己的胆识将法国从外敌入侵的危险中拯救出来，但两年后也被恐怖浪潮席卷而去：“虽然满身缺陷，但他毕竟是个个人物；他有火一般的热情，有一种源于自然的伟大的火热胸怀。”[就在卡莱尔写作此书时，格奥尔格·毕希纳正给德国人上演他的《丹东之死》（1835年）；在这部剧作中，相比于那些合谋杀害他的小人，如罗伯斯庇尔之流，丹东太有英雄气概了。]最后一个人是拿破仑，他在1795年把军队带入政治，用“一阵霰弹雨”浇灭了巴黎最后的叛乱。

戏剧化表现

卡莱尔的文字有别具一格的力度，它给后世留下的关于那段岁月的印象成了司空见惯的常识：没完没了的骚乱，血腥暴

虐，无情的“无套裤汉行径”，咆哮愤激的暴民。他的描述具有不可抗拒的戏剧效果。不过，卡莱尔同样关注无辜受难者的悲怆，这些人是人力无法控制的暴力的牺牲品。甚至当罗伯斯庇尔身披他的天蓝色新斗篷、坐在车上辘辘驶向断头台时，作者也流露出些许同情。这本书读来既让人激动，也令人震骇，人们把它当小说读，书也卖得像小说一样好。小说家们欣赏它，这方面没有人比得上查尔斯·狄更斯。

的确，狄更斯在《双城记》（1859年）中刻画的法国大革命形象，对后世人的影响至为深远。这部小说从柏克那里借用了6 一个基本主题——狂暴、骚动的巴黎与安全、繁荣和宁静的伦敦之间的对比。但是，对狄更斯来说，最明显的指导者和启发者是卡莱尔。他采用了后者关于旧体制的描写：一幅残酷的、压迫性的阴暗画卷，一个“纵情掠夺和压迫”的世界，那里清白无辜的不幸之人，会因权势者一时兴起就被囚禁在阴森险恶的巴士底狱，根本不经过审判而在狱中度过数年；那里的贵族觉得，甩下一枚金币就可以补偿轧死在自己马车轮下的孩子的生命。声誉扫地的掌权者统治着赤贫又悲惨、对社会充满怨恨的人民，其中有位德伐热太太，她一边冷漠固执地忙着手头的编织活儿，一边为复仇到来的时刻筹划着，到时就可以报复欺压她家人的贵族老爷们了。革命爆发，这个时刻终于来了：“‘巴士底！’这吼声听起来像是全法国的呼喊都已凝结在这个令人憎恨的字眼中，人间的海洋随着这咆哮声翻腾，来自深处的浪潮一层层涌起，最后淹没了这座城市。警钟已敲起，鼓已经被捶响，暴怒的大海正在滩头发发出雷鸣般的吼叫，攻击开始了。”德伐热太太帮着引领这一攻击：“‘什么！我们可以像男人们一样去杀人……！’随

着她一声尖厉而饥渴的呼喊，一伙妇女便聚集到一起，她们的武器五花八门，但她们都是在饥饿与仇恨中拿起武器的。”这样的骚乱持续了好几年，到1792年，断头台成了复仇的工具。德伐热太太和她的复仇伙伴们便围着断头台编织，一针针地计算着死者的数目。法国到处是“头戴红帽和三色徽、佩带民族火枪和马刀的爱国者”，他们阴郁多疑，发自本能地憎恶所有“贵族”。“衣着体面的人应该送进监狱，就像穿劳动服的工人应该去劳动一样。”到1794年初，

每天，在石头铺成的街道上，装满被判刑者的小轮车剧烈颠簸着。可爱的姑娘，明丽的妇人，头发有褐色的、黑色的、灰色的；有年轻人、健壮男子和老人；有贵族出身的、农民出身的：所有这些人都是献给断头台的红酒，他们每天都从可怕的监狱的阴暗地窖中被带出来，穿街走巷送到刑场上，以满足断头女神嗜血的饥渴。自由、平等、博爱，或者死亡——哦！最后一个词授予断头女神要容易得多！

虽然法国贵族夏尔·达尔奈逃过劫难，迫害他的德伐热太太也在追究达尔奈之前就被杀了，但在小说的最后，为了满足德伐热太太的复仇欲望，英国律师西德尼·卡尔顿还是自愿牺牲在断头台上。

这些与浓墨重彩、令人心碎的故事交织在一起的形象，为奥斯卡·王尔德那一代人确定了看待法国大革命的标准。对于下一代人，以及整个20世纪，这些形象因为蒙塔古·巴斯托那些不太有才气的文字而更加强化；她很可疑地利用了自己遥